

#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on a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黑人女性的性徵與性身份認同——格洛麗亞·  
奈勒小說《貝雷的咖啡館》對聖經女性的重寫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GUO, Xiaoxia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Download date	2026-06-23 03:18:03
Link to Item	<a href="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392">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392</a>

# 黑人女性的性征与性身份认同

——格洛丽亚·奈勒小说《贝雷的咖啡馆》对圣经女性的重写

郭晓霞

**内容提要:**美国当代著名黑人女作家格洛丽亚·奈勒在其小说《贝雷的咖啡馆》中,通过对6个圣经女性故事的重写,颠覆了圣经中被父权社会支配的女性形象,揭示了传统社会妓女/圣女身份被建构的过程,探讨了黑人女性性征和性身份认同中的影响因素,并给黑人女性指出一种多元的、流动的性身份。

**关键词:**性征;性身份;圣经女性;重写

## Sexuality & Sexual Identity of Black Females

——On the Rewriting of the Biblical Women Stories

in Gloria NAYLOR's *Bailey's Cafe*

GUO Xiaoxia

**Abstract:** Gloria NAYLOR, a famous contemporary American black woman writer rewrote six stories of the women in the Bible in her *Bailey's Cafe*, subverting the corresponding female images dominated by patriarchal

society. By this, NAYLOR exposed that being whores or saintesses were made, not born. Meanwhile, NAYLOR examined factors that influenced sexuality and sexual identity of black females, and indicated a changing and multiple identity of sexuality for black women.

**Key words:** sexuality; sexual identity; women in the Bible; rewriting

格洛丽亚·奈勒(Gloria Naylor, 1952—)是美国当代文坛最重要的黑人女作家之一,自1982年发表处女作《布鲁斯特的女人们》(*The Women of Brewster Place*)至今,已经创作完成了6部小说<sup>①</sup>,多次获得“美国图书奖”等奖项,以致成为与托尼·莫里森和艾丽丝·沃克比肩的先锋作家。

奈勒善于利用多种资源进行创作<sup>②</sup>,最擅长运用圣经。奈勒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耶稣见证人会”信徒,受母亲影响,她在1968年高中毕业后没有直接考大学,而是加入了“耶稣见证人会”<sup>③</sup>,从事了七年传教工作。她坦言自己“很多次有意识地使用圣经的暗示”,“因为圣经是我的一部分,所以我运用圣经进行创作”<sup>④</sup>。她对圣经的运用集中体现于其第四部小说《贝雷的咖啡馆》中,该小说对圣经中的女性故事进行直接重写,透过那些女性形象对圣经予以女性主义诠释,并探讨女性尤其是黑人妇女的性征和性身份建构问题。

① 分别是《布鲁斯特的女人们》(*The Women of Brewster Place*, 1982)、《林顿山》(*Linden Hills*, 1985)、《戴妈妈》(*Mama Day*, 1988)、《贝雷的咖啡馆》(*Bailey's Café*, 1992)、《布鲁斯特的男人们》(*The Men of Brewster Place*, 1999)、《1996》(2005)。

② 如《林顿山》在结构上模仿了但丁的《神曲·地狱篇》和哥特式小说,《戴妈妈》与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互文。

③ 该宗教团体产生于1870年代后期的“圣经学生运动”,其教义以对圣经的阐释为基础,是一个“圣经学生团体”,主要办公地点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区。

④ Maxine Lavon Montgomery ed., *Conversation with Gloria Naylor*.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4, 127.

## 一、“即席伴奏”：诠释的策略

《贝雷的咖啡馆》主要透过咖啡馆老板的视角讲述1948年夏至1949年夏发生在贝雷咖啡馆及其邻里之间的故事,小说采用布鲁斯音乐的结构形式,由“大师,请您……”(Maestro, if you please...)、“即席伴奏”(The Vamp)、“第三节脚本”(The Jam)、“收尾”(The Wrap)四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大师,请您……”交代了咖啡馆的由来和咖啡馆现任老板的经历。咖啡馆现任老板即叙述者是二战退役的老兵,和妻子一起经营着一个小咖啡馆,但是他的名字并不叫“贝雷”,“贝雷”是先前老板给这个咖啡馆起的名字,叙述者接手以后仍然沿用这个名字。形形色色的客人来到咖啡馆,咖啡馆老板向读者讲述了经常光顾的一些客人,主要是6个女性的故事。首先,在第二部分“即席伴奏”中,叙述者提到两个常来光顾的客人——一个愤世嫉俗的修女卡丽(Carrie)和一个小个子男人休格·曼(Sugar Man),二者都在工作日到来,前者胃口极好,后者则吃剁碎的食物,他们对一些问题包括对6个女性的看法总是不一致。标题“即席伴奏”有两重涵义,作为音乐术语,指歌手正式演唱之前的伴奏或伴唱;作为俚语,则指娼妓。两重涵义都有一定的所指,从字面意思看,前者说这两人仅是次要人物,后者说接下来要讲的是娼妓之事。但这些都是表象,和咖啡馆不真实的名字一样,叙述者声称“一切真正值得细听的事情潜藏在……表面之下”<sup>①</sup>,因此叙述者提醒读者,应该用怀疑的眼光从深层解读接下来那些所谓娼妓女们的故事。同时,奈勒借此表明,她对圣经女性的故事首先使用了怀疑诠释学(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sup>②</sup>。以此为基础,奈勒从社会的象征体系

① Gloria Naylor, *Bailey's Cafe*. Orland: Vintage Contemporaries, 1992, 35.

② 怀疑诠释学是西方女性主义圣经学者提出的圣经诠释方法,主要代表人物包括菲奥伦查(Elisabeth Schussler Fiorenza)和犹太裔女性主义诗人、批评家奥斯特丽克(Alicia Suskin Ostriker)。

和基督教的边缘出发,讲述了6个被传统社会定义为“妓女”的故事,从而对圣经女性和黑人女性进行“愿望诠释学”(hermeneutics of desire)<sup>①</sup>的释读。

## 二、母亲的性别社会学

母亲形象和母亲身份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运动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方面,父权制社会所塑造的“母亲神话”对女性自身解放产生了束缚作用,女性主义者欲解构“母亲神话”以打破束缚;另一方面,母亲对女儿的性征和性身份认同往往起着重要作用。

莎蒂是小说中第一个出场的源于圣经的女性,与圣经中的撒拉相对应,莎蒂(Sadie)的名字便来自圣经中的撒拉(Sarah)。撒拉是犹太族长亚伯拉罕的妻子,美丽、高贵、顺服。根据《创世记》11:10—21记载,亚伯拉罕和妻子撒拉逃荒到了埃及,亚伯拉罕担心埃及人因其妻子撒拉美丽而杀了自己,便对外谎称撒拉是自己的妹妹。面对丈夫的自保,撒拉没有任何怨言和反抗,而是默默地顺从丈夫,甘心被埃及法老带走。圣经没有记载被丈夫出卖、被法老带走后的撒拉是如何想的,即她是为了自保才沉默呢?还是在一个父权制社会里根本就没有想过反抗?无论如何,圣经中的撒拉顺服了丈夫,做了埃及法老的妓女。奈勒则对撒拉实施“愿望诠释学”,让她发出自己的声音。

与撒拉相似,莎蒂对自己的身体最初也没有支配权。莎蒂的母亲是个妓女,在坠胎未果的情况下生下莎蒂。幼年的莎蒂在母亲的鞭打下长大,认为自己之所以被鞭打,是因为不够乖巧,为了赢得母爱,她努力表现得乖

① 奥斯特丽克在“怀疑诠释学”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愿望诠释学”。她认为圣经不应该被视为持续、整一、真实的文本,而具有多重意义和不确定性,因此她鼓励妇女借助圣经释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对那些贬抑女性的文本进行超越性阅读,从文本中获得力量。关于奥斯特丽克等学者的女性主义圣经诠释,可参见郭晓霞硕士论文《重现伊甸的丰荣——圣经的女性主义文学诠释》(2003,未刊稿)。

巧。尽管她和撒拉一样顺服,仍在13岁时被逼卖身。但与撒拉不同的是,莎蒂始终有自己的梦想,并以自己的方式为之奋斗。幼年的莎蒂处处小心,梦想着自己的勤奋和努力能换来母爱;母亲去世后,仍然梦想着有个家。嫁给比自己年长30岁的酒鬼丹尼尔(Danier)后,莎蒂将家收拾得一尘不染,在院子里种满了红色的天竺葵。丈夫去世后,为了保住唯一的安身之所,她身兼数职,终日拼命挣钱,但最终还是没有挣够丈夫前妻之女索要的钱财数目(200美元),被赶出家门。无家可归的莎蒂靠酒精麻醉自己,梦想成了醉后的幻觉;在她看来,唯有喝酒才能保持住这醉后的幻觉——梦中的家。她重操旧业只是为了买酒,每次向嫖客只要25美分,从来不要更多。然而做了职业妓女的莎蒂仍然自尊、自立,并不接受救济,还拒绝了卖冰人琼斯(Jones)的帮助和求婚。她一生纯真、本色,一直有着“一双四岁孩子的眼睛,梦想着能够活下去”<sup>①</sup>。奈勒笔下的莎蒂成为一个有梦想的主体,她为实现梦想采取的手段尽管值得商榷,但是相对于圣经中作为客体存在的沉默者撒拉和世俗中堕落、邈遏、自私的妓女,莎蒂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但莎蒂的遭遇又与圣经中的撒拉不同。在圣经中,撒拉被自己的丈夫出卖了,父权制是她忍屈受辱的罪魁祸首;而在《贝雷的咖啡馆》中,莎蒂的母亲在女儿堕落的过程中负有首要责任。幼年的莎蒂曾一次次重复着这样的梦想——自己有一天拿到了大学的学位证书,或者成为一个衣着考究的职员,这时妈妈与她共进午餐,送给她一束玫瑰花,还说“我知道你能做得很好,我以你为骄傲,莎蒂,你是个好姑娘”<sup>②</sup>。然而,在现实面前,梦想被瞬间击碎。身为妓女的母亲不但没有给莎蒂应有的母爱,竟然还逼迫自己13岁的亲生女儿去接客,就这样决定了莎蒂的命运。通过莎蒂与她母亲的关系,奈勒表明,就女性的性身份认同而言,母亲起着重要作用。母亲通过自己的母亲角色和女性角色,使得性别社会学观念得到循序再生,由

---

① Gloria Naylor, *Bailey's Cafe*. Orlando: Vintage Contemporaries, 1992, 70.

② Gloria Naylor, *Bailey's Cafe*. Orlando: Vintage Contemporaries, 1992, 44.

此,母亲会“不自觉地成为父权制社会得以延续的同谋”<sup>①</sup>。

“玛丽(镜头2)”中的玛丽亚姆(Mariam)是第六个出场的圣经女性,对应圣经中的圣母马利亚。在圣经中,圣母马利亚是个圣处女,从圣灵感孕生下耶稣。在《贝雷的咖啡馆》中玛丽亚姆未被任何男人碰过却怀有身孕,也应属圣灵感孕,但这位玛丽亚姆却彻底颠覆了圣经的圣母形象。玛丽亚姆的族人是恪守宗教习俗的犹太人,他们认为,生下女婴的产妇不洁净,必须独处净身;已婚女人也不洁净,不能靠近神像;女孩只有接受了割礼才贞洁。按照族人的习俗,他们对玛丽亚姆实施了女性割礼。所谓女性割礼,即将女性的生殖器官用刺槐刺穿透,用线缝合起来,然后插入一个小细管排尿,意在防止女性性交,确保其贞洁<sup>②</sup>。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圣母马利亚从圣灵感孕相似,被实施了女性割礼的玛丽亚姆不久后也怀孕了。当族长审判玛丽亚姆“孩子的父亲是谁”时,玛丽亚姆一再说“没有男人碰过我”<sup>③</sup>。在圣经中受圣灵感孕生下耶稣的马利亚被当作圣母崇拜,而未被男人碰过就怀孕的玛丽亚姆却被当作荡妇遭审判、被驱逐。通过玛丽亚姆形象,奈勒揭示了父权制社会的虚伪及其对妇女态度的悖论。

圣母马利亚是父权制社会全力打造的与夏娃截然对立的女性形象,是一个屈服的、喜悦的、被祝福的、光明的、救赎的、复归的、与上帝结合的、非性的人物。但是,正如女性主义神学家所发现的,其矛盾之处在于她的处女身份和母亲身份共存<sup>④</sup>,由此,父权制建构的马利亚形象难免自相矛盾,其“自我矛盾的核心在于混淆了纯洁与性爱”<sup>⑤</sup>。由此可见,父权制社会一

① 郭晓霞:《五四女作家和圣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39页。

② Gloria Naylor, *Bailey's Cafe*. Orland: Vintage Contemporaries, 1992, 151—152.

③ Gloria Naylor, *Bailey's Cafe*. Orland: Vintage Contemporaries, 1992, 134.

④ 神学家达利指出:“没有妇女能达到那个境界……”参见 Mary Daly, *Beyond God the Father: toward a Philosophy of Women's Liber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73, 62.

⑤ Barbara Hill Rigney, *Lilith's Daughters: Women and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2, 36.

方面赞扬马利亚的纯洁,一方面又对其作为女人而具有的性爱与生殖力量产生恐惧。小说中玛丽亚姆的故事便揭示了父权制社会“母亲神话”建构过程中的纠结与矛盾心态。

在“怀疑诠释学”的基础上,奈勒还描述了另一个人物——玛丽亚姆的母亲。如果说父亲所代表的父权制体系是阉割玛丽亚姆性意识和性征的罪魁祸首,玛丽亚姆的母亲就是其中的帮凶。母亲出现在了玛丽亚姆被施予割礼的现场,“当她发现正派得体的丈夫难以从众多处女中挑选出准备行割礼的女儿时,她便让产妇们靠紧女儿”,她认为,这样做可以“提升一个妇女的价值”,而“她是多么地爱她的女儿”<sup>①</sup>。如果说莎蒂的母亲由于不爱女儿而将其推上了妓女的道路,那么玛丽亚姆的母亲则是由于对女儿的错爱而成了残害女儿的凶手,二者在女儿性身份的认同过程中,都使之不自觉地认同她们自身所象征的性身份,以致影响了女儿性身份认同的主体选择。通过莎蒂和玛丽亚姆及其母亲们的故事,奈勒揭穿了父权制社会所塑造的“母亲神话”的谎言,同时指出母亲在女儿性征和性身份认同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 三、性与原罪

如前所述,西方传统文化通常将女性的性身份界定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圣女”和“妓女”。根据《创世记》记载,夏娃因违背上帝的诫命偷食智慧树上的果子,被上帝逐出伊甸园,因此她所犯之罪是原罪,那原罪与蛇的引诱有关,而蛇的引诱象征着欲望和性<sup>②</sup>,由此夏娃所犯的罪又与欲望和性相关,夏娃也就成为原罪和性的同义语。这是西方传统文化界定女性性身

---

① Gloria Naylor, *Bailey's Cafe*. Orlando: Vintage Contemporaries, 1992, 152.

② 女性主义学者认为蛇象征着女性意识。Babbi Elyse Goldstein, *Revision: Seeing Torah through a Feminist Lens*. Woodstock: Jewish Light Publishing, 2001, 56.

份的起点。因此,女性主义者要祛除西方传统文化对女性性身份的父权主义界定,必须从夏娃开始,而要建构新的女性性身份,也必须从夏娃开始。

第二节“夏娃之歌”重新讲述了《创世记》中的夏娃故事。在奈勒笔下,夏娃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只知养父是派勒特镇(Pilottown)的牧师,夏娃将他称为“神父”(Godfather)。“神父”不仅是镇上的牧师,还是学校的簿记员、棉花交易的测量主管,身兼阐释者、审判者、测量员三职,对应于上帝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尽管“神父”在派勒特镇无所不在,却仍然成为村民指责的对象,因为他对养女夏娃的身体爱抚被视为带有性的倾向。为了平息流言蜚语,他不再给逐渐长大的夏娃洗澡。由于没有了“神父”的身体爱抚,夏娃就从游戏中寻找身体的愉悦。她经常强迫一个名叫比利(Billy)的男孩与她同玩一种游戏——夏娃躺在草丛中将身体尽量接触土地,然后男孩用力踩踏土地。一次夏娃赤身裸体躺在地上做游戏,被“神父”发现了,以致被“神父”一丝不挂地逐出伊甸园——即“神父”的家和派勒特镇,成为妓女和妓院老板。

在“夏娃之歌”中,奈勒首先揭示了父权主义对圣经的挪用行为:

神父总是告诉我,既然我没有一个真实的父亲或母亲,如果没有他,我就不能活下来,那么,他将决定我是什么时候出生的……无论我什么时候问他,我的生日是哪一天,他总是从一年变到另一年,从一个月变到另一个月……当他想教育我时,他就是那么有耐性。<sup>①</sup>

这段话揭示出圣经中创世叙述的权力动力学(the power dynamics)。根据圣经记载,上帝是人类的唯一创造者,赋予女性以生殖的能力。但是在奈勒笔下,“神父”却在夏娃出世的问题上模糊不清。奈勒借此揭示出传

<sup>①</sup> Gloria Naylor, *Bailey's Cafe*. Orland: Vintage Contemporaries, 1992, 82.

统社会对创世故事进行了父权主义挪用,删除了早期神话传统中的女神及其创世的故事。“神父”不但在创世问题上模糊不清,也在讲坛上对雷声等自然现象束手无策。奈勒的怀疑诠释学消解了逻各斯在圣经中的绝对权威地位。

其次,奈勒对夏娃的“罪”及其所代表的性征进行了重新界定。传统社会将夏娃的罪与性联系起来,奈勒则运用“愿望诠释学”,写出了夏娃性意识的发展过程。夏娃从小具有对身体愉悦的渴望,非常喜欢“神父”给她洗澡,为了能得到“神父”的爱抚,有时候她假装滑倒以便能抓住“神父”的胳膊。当“神父”不再给她洗澡后,夏娃便觉得很失落。后来,在和一个小男孩玩游戏时,夏娃的胸脯会从粗糙的衣服中显露出来,她由此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体,感觉到一种快乐和放松,后来便经常强迫那个男孩与她一同玩这种带有性色彩的游戏。显然,在这里,夏娃的表现是一种青春期少女的单纯性身份探索和认同行为。借助于这样的“愿望诠释学”,奈勒将夏娃与性相关的原罪合法化,驱除了夏娃身上的父权制魔咒。可见,此夏娃已非彼夏娃,她尽管被视为旅馆中众妓女之首,是鸨母,但她“不仅独立,而且能够为他人疗伤,并帮助姐妹们找回自信,确立自我价值”<sup>①</sup>。夏娃被“神父”逐出“伊甸园”后,经过辛苦跋涉和艰苦努力,来到那个城市,建造了一座自己的旅馆。她接纳了那些无家可归、伤痕累累的女性,像母亲一样照顾她们,如为玛丽亚姆接生,帮助杰西·贝尔戒毒等。

#### 四、被奴役的妇女与性权力

如果说“夏娃之歌”通过审查夏娃原罪的性化本质,揭穿了伊甸园神话

---

<sup>①</sup> 林文静:《玛利亚/夏娃:故事的重写——格罗丽亚·内勒小说〈贝利小餐馆〉的女性主义解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年第10期,第52页。

的父权制秘密,那么“甜蜜的以斯帖”就揭穿了被奴役的妇女的性权力话语。据《以斯帖记》记载,犹太女子以斯帖父母早亡,从小由堂兄末底改抚养成人,后来遵照其要求隐瞒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被亚哈随鲁国王立为王后。后来,末底改怠慢了宰相哈曼,哈曼密谋在普珥节那天诛杀犹太人。经末底改请求,以斯帖沐浴、盛装,冒着生命危险去拜见亚哈随鲁王,揭穿了哈曼的阴谋,拯救了犹太人。以斯帖因其自我牺牲精神而受到犹太人爱戴。但是,正如女性主义学者们所认为的,在圣经叙事中,“以斯帖的行动不是出于独立自主的主观性或对其民族自发的关心,而是出于对堂兄的顺服,甚至是畏惧”<sup>①</sup>,而且,以斯帖与圣经中其他女性英雄一样,在履行了父权制强加给她们的功能后便消隐(invisibility)了<sup>②</sup>,因为《以斯帖记》的结尾将以斯帖的功劳归于堂兄末底改,以致“犹太人末底改作亚哈随鲁王的宰相,在犹太人中为大,得他众兄弟的喜悦,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帖 10:3)。从性别政治的角度看,以斯帖的身体在履行有限的主动性之际,成为以末底改为代表的犹太民族和国家利用的工具,以致父权制叙事下的爱国女英雄以斯帖实际上不过是国家和民族的妓女。

奈勒笔下的以斯帖从女性主义视角重写了圣经中的以斯帖故事。在《贝雷的咖啡馆》中,从小失去父母的以斯帖由哥哥抚养长大,12岁时由他做主嫁给了一个富有的农场主,那人拥有400英亩土地和7个劳工,以斯帖的哥哥就是那些劳工中的一个。同样,以斯帖出嫁前,被哥哥一再告知,务必做丈夫让她做的任何事情。以斯帖虽然成为了农场的女主人,实际上却是丈夫的性工具,每天呆在黑暗的地下室里接受农场主的性虐待。为了报答哥哥的养育之恩,她默默忍受了12年被性虐的日子,哥哥的生活则因以斯帖的捐躯和忍受而富足、和平。以斯帖成为男人们之间用以交换的物

① Alice Bach, *Woman in the Hebrew Bible: A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80.

② 消隐是女性主义神学和解放神学的共用术语,指圣经妇女的形象、声音、地位及其重要性在父权制文化中被消解或被边缘化的事实。

体,女人的性则成为男人利用的工具。同时,以斯帖的遭遇还揭示了美国文化深处的奴隶制的罪恶。

奈勒对圣经中的以斯帖进行了“愿望诠释”。其超越之处在于,以斯帖最终认识到了“恨”,而“恨”这一感情是主体意识苏醒的体现,由于“恨”这一主体意识的驱使,以斯帖最终逃出农场,结束了为家捐躯的“妓女”生活,确立了一己的性身份。

## 五、被生成的妓女/圣女

正如波伏娃提出的著名观点“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奈勒在《贝雷的咖啡馆》中提出了“妓女/圣女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观点,主要体现在第四节“玛丽(镜头1)”中的桃子/玛丽故事中。桃子/玛丽(Peaches/Mary)对应于圣经中的抹大拉的马利亚(Mary Magdalene)<sup>①</sup>。在基督教文化语境中,抹大拉的马利亚最初是一个妓女,后来弃恶从良。圣经先后记载六七个名叫马利亚的女人,包括圣母马利亚(路1:5—55)、约翰马可(曾经跟随彼得或保罗的一位信徒)、圣母马利亚的母亲(徒12:12),以及根本未被说明身份的马利亚(罗16:6)等;其他被唤作马利亚的女性的身份都难以确认,说法不一<sup>②</sup>。圣经中多次提到抹大拉的马利亚<sup>③</sup>,但描述的都是她见证耶稣被钉十字架和复活的事情,并未提及她的妓女身份。据《路加福音》7:36—50记载,加利利有一个有罪的女人,用自己忏悔的眼泪为耶稣膏抹,叙述者未说明那个女人犯了什么罪,只是随后的8:2提到,耶稣从抹大

① Virginia C. Fowler, *Gloria Naylor: In Search of Sanctuary*.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6, 130.

② 杨慧林:《“大众阅读”的诠释学结果——以抹大拉的马利亚为例》,《圣经文学研究》第1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第321页。

③ 《马太福音》27: 56, 61; 28: 1;《马可福音》15: 40, 47; 16:1, 9;《路加福音》8: 2; 24: 10;《约翰福音》19: 25; 20:1, 18;这些经文均提到抹大拉的马利亚。

拉的马利亚身上驱赶出过七个鬼。根据圣经经文的互文性特点,早期教父将《路加福音》7:36—50所称“有罪妇女”与被赶出七个鬼的抹大拉的马利亚合二为一,并根据女人之罪与性相关的传统思想,把罪孽深重的抹大拉的马利亚视为妓女,于是,抹大拉的马利亚成为一个忏悔的妓女形象。由于抹大拉的马利亚同时具有忏悔的妓女和耶稣复活的第一个见证者这种双重身份,她遂与夏娃、圣母马利亚共同成为西方世界对待女性观点的重要基础。抹大拉的马利亚兼具妓女与圣女两种品质,其形象反映出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被赋予的分裂身份和品格。

奈勒笔下的桃子/玛丽便是一个在父权制压制下最终精神分裂的女性。与身份模糊的抹大拉的马利亚一样,桃子/玛丽没有确切的名字,只知其父亲叫她桃子,而另一个崇拜她的瘸腿男人叫她玛丽。不确定的名字表明了这个女性身份的不确定性;两个男人曾对她命名,表明其身份由男人确定。她的价值也由男人确定:父亲将美貌的女儿叫桃子,因为她是“丰满的和甜蜜的”、“黄色的和甜蜜的”<sup>①</sup>,表明父亲只看到了女儿的外表,而忽略了女儿的内在价值;瘸腿男人随意称她为玛丽,将其神圣化,说明那个男人在抹杀她的主体性。因此,“从对桃子/玛丽的命名可见,她一开始就没有自己的身份,而被当成一个客体,被物化、神化了”<sup>②</sup>。尽管她学习成绩优异,工作出色,但其周围的各色男人却看不到这些内在价值,而以她的外表定义她,玩赏她。后来,父亲送给她一个礼物——镜子。镜子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象,根据拉康的镜像理论,个体不能主动确立自我主体,只能在一个对象化了的他人镜像中认同自我身份。桃子/玛丽对自己性身份的认同也是对镜子中的影像进行认同,问题是这个镜子是父亲给的,是父权制的镜子,而父权制镜子中的影像本身就是虚假的。所以,桃子/玛丽看不到真

① Gloria Naylor, *Bailey's Cafe*. Orland: Vintage Contemporaries, 1992, 102.

② 林文静:《玛利亚/夏娃:故事的重写——格罗丽亚·内勒小说〈贝利小餐馆〉的女性主义解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年第10期,第53页。

实的自己,而是分裂成妓女桃子和圣女玛丽两个人格。但无论哪一个,都是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扭曲和想象,是虚假的。换句话说,无论是妓女桃子还是圣女玛丽,都不是天生的,而是被社会建构的。奈勒借助精神分裂的桃子/玛丽,揭示出父权制社会中妓女/圣女被建构的过程,谴责了父权制权力话语对女性的戕害。具有颠覆意义的是,奈勒还指出了女性超越父权制权力话语的路径。在其小说中,桃子/玛丽在本我的内在驱动下,自我毁容以逃脱外表的羁绊,显示出对父权制权力话语的反抗。后来,在夏娃的帮助下,桃子/玛丽逐步认识到自己的性征和自我价值,找回了完整的自我。

## 六、多种冲突下的性迷失

与白人妇女不同,黑人妇女确认其性征和性身份时,往往面临着种族、阶级等多种价值观的冲突,以致更容易迷失方向。第五节“杰西·贝尔(Jesse Bell)”的故事便探讨了这一点。

小说中杰西·贝尔对应于圣经中的耶洗别(Jezebel)。《列王纪上》第16—21章、《列王纪下》第9章都记载了以色列国王亚哈的王后耶洗别之事。耶洗别本是迦南城邦西顿国王的女儿,与以色列人信仰耶和华不同,她信奉巴力神。成为以色列王后以后,她强迫丈夫亚哈(Ahab)和以色列人背叛自己的信仰,去信奉她所信奉的巴力神,还将敢于直言的先知以利亚(Elijah)驱逐。耶洗别最令人发指之事是为了帮助丈夫夺取一个名叫拿伯的普通农户的葡萄园,亲自操纵歹徒将拿伯杀害。鉴于耶洗别的邪恶与歹毒,先知以利亚预言她必被狗吃掉。亚哈倒台后,新任以色列国王耶户前往捉拿耶洗别,她得知消息后便擦粉梳头,准备色诱耶户,但阴谋未成而被耶户从窗户扔下去,其尸体被狗吃得只剩下头骨和脚。在西方传统文化中,耶洗别成为淫荡邪恶女人的代名词。

奈勒重写了圣经中耶洗别的故事。与其他女性人物一样,为了让笔下

人物具有与圣经相对应人物的背景,奈勒让杰西·贝尔具有与耶洗别相似的身份和遭遇。奈勒改变了耶洗别的公主身份,而让杰西·贝尔出身于工人阶级,却保持了耶洗别的异教信仰特征,使她与其中产阶级出身的丈夫持有不同的生活习俗和信仰,而且其丈夫属于金姓家族(King family),“金”(King)对应于亚哈的国王身份。奈勒还设置了一个与先知以利亚相对应的人物——丈夫的叔叔以利(Eli)。奈勒将其笔下人物在身份上与圣经一一对应,但却使其有着与圣经对应人物截然不同的性格品质。杰西·贝尔的丈夫并非残暴的男人,而是金家唯一接受并深爱着杰西·贝尔的人;叔叔以利虽然拥有先知以利亚的名字,并坚决反对杰西·贝尔,却不是先知以利亚,而且还背叛了自己的信仰——黑人身份。正如杰西·贝尔所言,“它们(白人 White folks)是以利叔叔的神”,以利将白人和白人文化奉为圭臬,是一个“真正的白人”<sup>①</sup>。以利不但是一个白人种族主义的黑人内化者,还是一个具有等级观念和父权制思想的家长,瞧不起工人阶级出身的杰西·贝尔,将她看作奴隶,称她做的菜是“奴隶的食物”。以利还利用一切手段离间杰西·贝尔与丈夫和儿子的关系,不让她管教自己的儿子,而让其儿子接受白人教育。与耶洗别不同,杰西·贝尔最初本是一个敢说敢为、富有活力的贫家女孩,却最终成为父权制、等级制以及内化于黑人的白人种族主义的牺牲品。在以利的侮辱、蔑视与策划下,杰西·贝尔无法与丈夫、儿子交心,最终在酒精、毒品和同性恋的刺激中寻找慰藉。因此,她陷于种族之间(黑人和白人价值观)的冲突,阶级之间的冲突,异性恋与同性恋之间性身份认同的冲突,在三重冲突下,她迷失了自己的性征和性身份。与耶洗别一样,杰西·贝尔成为社团指责和蔑视的对象。但因其从来没有独立于男人对女性的界定而定义自己的性征,杰西·贝尔比其他女性受到的伤害要少些<sup>②</sup>。

① Gloria Naylor, *Bailey's Cafe*. Orland: Vintage Contemporaries, 1992, 125.

② Virginia C. Fowler, *Gloria Naylor: In Search of Sanctuary*.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6, 133.

通过杰西·贝尔的故事,奈勒揭示了父权制、等级制和内化白人种族主义对黑人女性性征和性身份认同的阻碍。

## 七、结语:贝雷和梅普尔小姐

如上所述,《贝雷的咖啡馆》共描写了6个黑人女性,但她们均非父权制社会所界定的“圣女”,而是所谓的“淫妇”或“妓女”:夏娃是旅馆的主人,那个旅馆被称为妓院,故夏娃被视为鸨母,其他5个女性居住在其旅馆里,均被视为妓女,莎蒂(Sadie)是地道的廉价妓女,玛丽亚姆被施行了割礼却仍然未婚先孕,桃子/玛丽是精神分裂、不知悔改的妓女,以斯帖是性工具,杰西·贝尔是个瘾君子。通过这6个“妓女”的故事,奈勒颠覆了圣经中被父权制社会支配的女性形象,揭示了传统社会中妓女/圣女身份被建构的过程,探讨了黑人女性性征和性身份认同中的影响因素。综上所述可知,作为父亲、丈夫、兄弟的男性,作为母亲、姐妹的女性,以及阶级、种族、性取向等等,都影响了黑人女性性征和性身份的认同。

但是,既已弄清楚这诸多要素,奈勒要给黑人女性确立何种类型的性征和性身份呢?答案存在于贝雷和梅普尔小姐(Miss Maple)这两个人物身上。上述6个黑人女性的故事都是贝雷讲述的,而贝雷的男性身份削弱了故事本身的讽刺和批判成分。梅普尔小姐出现在篇幅最长的“梅普尔小姐的布鲁斯”一节中,是小说最后一个出场的人物,但他并非女性,而是一个男性,本名叫斯丹利(Stanley),曾受过良好教育,还获得了博士学位,只是因其黑人身份谋职时一再受挫,而在夏娃的旅馆里做主管。由于斯丹利在炎热的夏天喜欢穿裙子,夏娃便给他起了这个“梅普尔小姐”的绰号。斯丹利不仅名字变成了梅普尔小姐,命运也发生了变化,他在夏娃旅馆的工作得心应手,并在其他公司举行的广告词征集大赛中屡屡获奖,还积极搞投资,挣的钱足够自己开公司。他充满了自信。黑人男性身份曾经一再使他

受挫,现在,性身份却不再是他实现梦想的障碍,他已经在男性和女性之间自由穿梭。正如奈勒自己所言,“梅普尔小姐和贝雷是我所讲述的关于性征和性身份故事的书档”<sup>①</sup>,通过贝雷的讲述和梅普尔小姐的故事,奈勒给黑人女性指出了一种多元的、流动的性身份,前提是她们能找到自我。

作者郭晓霞,河南民权人,许昌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博士后,主要研究圣经文学与女性文学。

---

<sup>①</sup> Maxine Lavon Montgomery ed., *Conversation with Gloria Naylor*.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4, 130.